

# 山海情：对口支援与企业跨地区经营

程 垦 陈勇兵\*

**摘要：**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1994年以来逐步推行的对口支援政策为切入点，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对口支援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对口支援显著促进了支援省份的企业在受援地进行跨地区经营。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对口支援主要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政府搭台”体现了有为政府破除市场失灵带来的企业跨地区经营障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国企“率先投资”效应以及金融财税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企业唱戏”则体现了有效市场的积极作用，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的跨地区经营，并且会促进与受援地区比较优势产业相契合的企业的跨地区经营，进而通过集聚效应自我强化，形成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本文为科学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实现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对口支援 企业跨地区经营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区域协调发展

## 一、引言

区域非均衡发展给世界各国的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和障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均衡(洪银兴,2020)。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不仅会带来发展损失,而且会导致社会保障、养老等方面发展不平衡,影响总体发展水平(许宪春等,202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

---

\* 程垦,讲师,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kencheng0717@foxmail.com;陈勇兵(通讯作者),教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yongbingchen@xmu.edu.cn。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503055)的资助。本文未使用AI。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展。”对口支援政策通过建立东西部援受结对关系促进特定地区发展,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也是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令人遗憾的是,现有对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案例评估对口支援政策的经济效益,仅有的几篇定量研究文献集中在宏观层面,即对口支援如何影响受援地区的经济增长(徐明,2023;李曦辉等,2023;张可云等,2023)。承载对口支援计划的主体是微观企业。因此提出疑问,对口支援政策仅仅是政府一厢情愿推动的吗?对口支援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影响企业跨地区经营的机制是什么?

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面临诸多挑战。第一个挑战便是现有文献普遍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援助双方并不是随机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实力、历史文化等因素,援助双方在进行援助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密切的经济交流<sup>①</sup>,而这些不可观测因素会影响支援企业在受援地进行经营的决策,从而导致直接回归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1994年以来逐步推行的东西部对口支援结对政策<sup>②</sup>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准实验。对口支援结对政策由中央统一部署,指定特定省份支援对应西部城市以建立援受结对关系。因此,本文以建立援受结对关系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作为处理组,而未建立援受结对关系的所有其他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作为控制组,使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对口支援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跨地区经营,并控制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固定效应、支援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和受援城市—年份固定效应,缓解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支援省份和受援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同时还控制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层面的干扰因素,例如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历史文化差异和贸易联系等。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科学度量企业跨地区经营行为。科学评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不仅需要能够全面反映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数据,还需要详细和准确的企业跨地区经营活动的选址信息(Giroud和Rauh,2018)。现有文献主要利用上市公司异地并购(杨继彬等,2021)和异地新建子公司数据(马光荣等,2020)衡量企业的跨地区经营行为。然而,一方面,这些衡量方式只是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描述企业的跨地区经营行为,而上市公司样本严重缺乏代表性,对于刻画地区间总体企业异地经营行为力有不逮;另一方面,子公司属于独立的法人企业,企业新建异地子公司行为更多地属于企业外部股权网络的扩张,无法全面刻画企业跨地区经营行为。因此,本文借助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利用1992~2015年所有工商注册企业新成立的异地分公司数目衡量企业跨地区经营

① 如2016年辽宁大连与贵州六盘水结对是延续两地人民的三线建设友谊联系。

② 根据援助任务,对口支援可以划分为四种:民族与边疆地区对口支援、东西部扶贫协作、赈灾应急对口支援和国家重大工程对口支援。

行为,并加总到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层面,形成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的面板数据。

鉴于此,本文利用1992~2015年全国工商注册数据,将企业新成立的分公司数目加总到支援省份—受援城市一年份层面,同时以1994年以来逐步推行的对口支援政策这一准实验为切入点,根据支援省份与受援城市间的援受结对关系,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对口支援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口支援政策显著促进了支援省份企业在受援地进行跨地区经营,不仅使得支援省份的企业在受援地开设的分公司数目增加,也使得支援省份企业在受援地开设的分公司数目占支援省份企业所有异地分公司的比例上升。特别地,相对于未建立对口支援结对关系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在建立援受结对关系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中,支援省份的企业在受援地新建分公司数目增加了20.2%,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可能干扰后依然稳健。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对口支援政策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具体而言,“政府搭台”发挥着有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通过提供组织服务,有效降低了企业面临的信息成本。例如,支援地区会派干部、企业家等人员去受援地区进行调研访问,帮助支援省份了解受援地区的资源禀赋等信息。实证检验证实,对口支援政策会显著促进高学历人员向受援地区的交流流动,并且会对信息成本更加敏感的跨地区经营活动促进作用更大。第二,政府引导下的国有企业“率先投资”行为对后续非国有企业的跨地区经营起到引领带动作用。第三,政府会给支援企业提供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以降低企业跨地区经营的融资和生产成本等,从而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与此同时,“企业唱戏”则体现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第一,在对口支援政策营造的有利环境下,以非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会参与跨地区经营。第二,市场力量推动了地区间比较优势的有效匹配,与受援地比较优势契合的企业会更倾向于进行跨地区经营,并进一步形成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格局。第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参与进一步引发了集聚效应,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持续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与当地优势产业的发展。

与本文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有三支。第一支文献聚焦对口支援。一些学者系统梳理了中国对口支援政策的起源、发展以及模式(赵明刚,2011)。另一些学者则评估了对口支援政策对受援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王玮,2010;董珍和白仲林,2019;徐明,2023;李曦辉等,2023;张可云等,2023;祝丽敏和于文蕾,2024;李磊等,2025)。令人遗憾的是,囿于数据的可得性,较少有文献从微观企业行为的角度评估对口支援的政策效果。汤玉刚和张鹤鹤(2024)以珠三角城市对口帮扶粤东西北为背景,发现对口支援双方共建园区会显著促进

企业投资设厂。区别于该研究仅关注对口帮扶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激励,并从利益共享的角度探究省内不同地区间的对口支援对新建异地子公司数目的影响。本文则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视角,进一步从“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角度,将企业新建异地分公司数目作为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代理变量,考察中国东西部地区间的对口支援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聚焦企业内部空间组织的跨地区分布。一些学者基于企业内部组织的跨地区分布现象(Galliano和Soulié,2012,贺灿飞等,2012),探究地区特有的冲击是否会通过企业内部网络传递到其他地区(Bernile等,2023;Giroud和Mueller,2019)。其他相关文献则研究企业跨地区经营行为的影响因素,例如地理距离(Acosta和Lyngemark,2021;Gumpert等,2022)、土地和劳动成本(Liao,2012)、市场潜力等因素。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已有学者从政府干预(方军雄,2008;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制度性障碍(宋渊洋和黄礼伟,2014)、地区间信任(曹春方等,2019)、CEO家乡偏好(曹春方等,2018)等视角讨论中国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因素。而从企业跨地区经营的方式来看,近年来,有一支文献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围绕母公司与子公司异地发展,从异地商会的分布(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交通基础设施(马光荣等,2020)以及对口合作(潘越等,2025)的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然而,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企业,新建异地子公司更多属于企业外部股权网络的扩张,并且现有文献对企业内部组织空间分布的研究大都使用存在严重样本选择问题的上市公司数据,无法全面地评估一项真实的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本文则在现有文献基础上,使用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将企业新建异地分公司数目作为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代理变量,全面评估对口支援这一项超大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

第三支文献主要关注外部产业投资的经济后果。Kline和Moretti(2014)以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建设为例,发现田纳西河流域建设不仅直接推进当地工业化进程,还通过吸引企业和劳动力集聚产生集聚效应,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与之类似,Fan和Zou(2021)基于中国“三线建设”的研究,发现“三线建设”投资对当地私营部门有着正向溢出效应,即使在外部投资结束之后,该溢出效应依旧明显。现有研究表明,外部投资的长期效果受地区特征影响,例如当地初始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地理气候环境等(Guillaumont和Chauvet,2001;Collier和Hoeffler,2004;Dalgaard等,2004)。然而,较少有研究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考虑外部产业投资有效性的决定因素。现有诸多外部产业政策大都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没有遵循地方经济的比较优势(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张莉等,2017;赵婷和陈钊,2019)。与这些产业政策不同的是,对口支援虽然是中央政府主导,但其同时也引入了市场主体

力量的参与,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发挥引导作用。在市场机制下,相较于其他企业,与受援地区比较优势相契合的企业会倾向于参与对口支援,进行跨地区经营。因此,本文则进一步从比较优势的视角,考察对口支援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机制。

##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 (一)制度背景

中国的对口支援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起初主要用于工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城乡工农协作。改革开放后,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口支援围绕这一目标得以确立、运用和发展。这个阶段的对口支援主要以输血式为主,由支援地区直接向受援地区提供资金、物资等,重点集中在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帮助贫困落后地区提高农业生产率等方面(王小林和谢妮芸,2022)。

对口支援政策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市场机制的缺失,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侯景新和于子冉,2021)。一方面,地方政府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地方政府通常会对本地区居民利益更加维护,再加上当时的对口支援政策比较模糊,没有明确援助任务、标准、范围和时间等,支援地区常常会采取消极的方式参与对口支援(张可云等,2023);另一方面,当时的对口支援政策通常是支援地政府单向的输血式援助,而为了使得支援资金的使用更加有效率,支援地政府通常会采取交钥匙工程的方式进行支援,即由支援政府全额拨付建设资金,并负责全部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待竣工验收合格后整体移交给受援地区使用。而对口支援双方互相协作的案例较少,支援地政府往往根据自身的意愿为受援地区提供援助,但不符合受援地区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支援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侯景新和于子冉,2021)。此外,这个阶段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主体大多是各级地方政府,几乎看不到市场主体企业的参与。

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决定在全国开展对口支援,将对口支援的对象拓展到西部其他贫困地区,在当年确定了9个省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的10个省份。2014年,国家启动了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四省市对口支援四川、云南、甘肃的4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为边疆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力量。时至今日,随着全国援藏、援疆的战略再次提升与行动跃升,对口支援实践的时间长度与影响深度呈扩展之势。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于以往以单方面援助为主的对口支援,这个阶段的对口支援更加强调东西部扶

贫协作,突出市场机制的作用<sup>①</sup>。

本文梳理了中国1994年以来的主要对口支援实践,如附表1所示,对口支援的援助任务不仅包括东西部对口支援,还包括应急赈灾对口支援,如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sup>②</sup>。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对口支援的结对关系呈现出由点到网的发展趋势。2021年市级政府参与结对数量是1996年的30倍左右,在1996年涉及19个省和4个单列地级市,而2021年变为18个省和119个地级市。在资源交换属性方面,由早期的财政、人事等行政资源交换,逐步扩展为技术、价值、能力等市场与社会资源交换,以区域间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社会帮扶等形式呈现。在资源受益模式方面,由西部单向获利转向东西部双向共赢,越来越多东部企业和社会组织自愿参与东西部协作<sup>③</sup>。不同于以往单向救济式的对口支援,也不同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调发展为代表的相邻城市间区域合作,1994年以来的对口支援更强调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地区间的互利合作,并主要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纯市场化合作相比,对口支援又多了各级政府牵引的纽带。因此,该时期的对口支援是一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即政府提供组织服务,牵线搭桥,将所有生产要素汇集到一起,市场理顺分配机制,坚持互利共赢,给参与双方提供行动激励。这是目前对口支援机制的核心,也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生动体现。

总的来说,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在破解大国规模治理难题实践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蕴含着厚重的历史逻辑、鲜明的实践逻辑和严谨的理论逻辑。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对口支援”作为一项促进资源横向转移以及通过政府间互助协作实现空间正义的规模治理技术,呈现出了良好的治理绩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模治理制度。

## (二)理论分析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市场被认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能够自发调节经济运行,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必须承担起修正的功能。中国跨区域市场难以自发形成有效的合作秩序,尤其是东部政府需要提供非辖区范围内的公共服务,更易造成跨域协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sup>①</sup> 对口支援政策突出市场机制的原因详见附录部分(一)。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sup>②</sup> 本文只考虑地方之间的对口支援,对于中央对地方的对口支援以及地方内部的结对支援,不予考虑。

<sup>③</sup> 由于1994年之前援助双方结对关系没有明确定义,政府大都是初步做了规划,并未有实质上的行动。并且在此之前企业参与对口支援较少,大都是政府间的财政转移以及中央政府的支持。因此,本文选取1994年之后对口支援政策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破除市场失灵带来的企业跨地区经营障碍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对口支援政策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由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与结对部署,实质上是构建了一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在该政策下,一方面体现为“政府搭台”,即政府提供组织服务,牵线搭桥,破除企业跨地区经营障碍;另一方面体现为“企业唱戏”,即政策通过引导市场合作,有效激发市场机制的活力,进而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因此,本文认为对口支援可能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

一方面,“政府搭台”的核心在于有为政府破除市场失灵带来的企业跨地区经营障碍。第一,对口支援政策会通过政府搭台降低企业跨地区经营面临的信息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企业跨地区经营会面临信息不对称,相比于本地企业,外来企业存在信息和资源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投资不确定性会使得参与对口支援的企业面临高昂的进入成本,也使得企业在整合和利用异地资源时面临着巨大障碍(Gordon 和 Bovenberg, 1996),并且现有研究发现企业的跨地区经营损害了企业价值(Gao 等, 2008)。而在对口支援政策中,支援双方政府作为东西部发展的桥梁,通过提供组织服务,帮助支援企业了解受援地区,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企业在受援地区进行跨地区经营。例如,支援地区会派干部、企业家等人员去受援地区进行调研访问,帮助支援省份了解受援地区资源禀赋等信息,从而提升企业对受援地区的了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二,本文认为在政府引导和制度压力下国有企业的“率先投资”也会对其他企业的跨地区经营产生引领带动作用。国有企业在对口支援中的率先投资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促进后续企业跨地区经营:一方面,国有企业“率先投资”积累的跨地区经营经验会降低其他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信息成本,帮助企业克服制度差距和市场分割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宋渊洋和黄礼伟, 2014)。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率先投资”带来的跟投效应,也会向市场传递政府支持力度和区域发展潜力的可信信号,同时国有企业在跨地区经营过程中也会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投资等改善跨地区经营环境,从而激发非国有企业的跟随投资。

第三,在对口支援的实施过程中,支援地政府和受援地政府出台的支持措施能够为企业跨地区经营提供系统的政策激励,促使更多企业在欠发达地区进行跨地区经营。中国企业具有复杂的属地关系<sup>①</sup>,通常只有属地企业才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与本地经营相比,企业在跨地区经营后税收与产值会在不

<sup>①</sup> 属地是指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即企业的生产经营获得能够纳入地方GDP核算与税收收入的空间范围。

同区域之间转移,导致企业难以获取市场所在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企业跨地区经营的意愿较低(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对口支援政策中,各级政府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对口支援,纷纷出台了形式多样、具有较高覆盖率的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现有文献已经证实,政策支持可以帮助企业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优势,降低跨地区经营的税收成本,进而增强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动机(吴育辉等,2023)。

另一方面,“企业唱戏”的核心在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第一,在市场机制下,将会出现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对口支援。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力量,其参与对口支援更注重自身的回报,即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无偿援助,企业在支援的同时也寻求自身的发展。因此,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对口支援也会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的跨地区经营。第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对口支援会促进与受援地区产业禀赋更加匹配的企业进行跨地区经营。支援省份中那些原本就从事与受援地区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的企业,会更倾向于进入受援地区进行跨地区经营。例如,劳动密集型地区会吸引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进行跨地区经营,而能源丰富地区会吸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进行跨地区经营。因此,对口支援会促进企业投资受援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三,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在跨地区经营时会形成集聚经济,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例如,率先进行跨地区经营的企业会吸引同类企业落户,形成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市场,企业间的协同合作也会促进技术交流和知识共享,配套服务体系的完善也会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从而持续吸引更多企业参与跨地区经营。

综上所述,对口支援政策通过“政府搭台”的方式破除企业跨地区经营面临的市场失灵,具体包括降低企业跨地区经营面临的信息成本、国有企业“率先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以及政策支持;并通过“企业唱戏”的方式,在市场机制下进一步促进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对口支援政策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

### 三、识别策略与基准结果分析

#### (一)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文以企业新建异地分公司来衡量企业跨地区经营行为,从而考察对口支援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所用到的数据主要有企业总部、分公司的地理数据、对口支援援受结对关系数据以及受援地区经济特征数据。

第一,企业异地分公司数据来自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所有工商企业注册号、成立日期、注销日期、所属行业、登记机关、所属地区、隶属

关系等维度信息。本文根据隶属关系变量识别出企业总部—分公司关系,得到每家企业对应的分公司信息。本文整理了1992~2015年所有企业每年新建的分公司数据,并统计了不同省份的企业在四位城市编码下不同城市的每年新增分公司数量。

第二,对口支援结对关系数据根据《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等资料手工整理得到。考虑到赈灾应急对口支援和国家重大工程对口支援主要是短期性的支援举措,其与本文研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题并不一致,因此将这两类对口支援政策排除。本文接着统计了不同对口支援实践的援受结对情况,例如,1994年对口援藏实践中,中央确定了江苏支援拉萨,山东支援日喀则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企业为何选择在A城市而非B城市建立异地分公司。理论上,企业的选择集合是除本省城市外的30个外省的所有城市<sup>①</sup>,而现有的分公司样本只能观察企业选择某城市之后的结果,而遗漏其余所有未被选择的省份。因此,借鉴Siegel等(2011)将跨国并购在国家配对层面加总的样本构建方式,将企业总部、分公司地理信息汇总到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层面,构建支援省份—受援城市配对样本<sup>②</sup>。此外,由于本文的处理组定义为建立援受结对关系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如江苏—拉萨—2010年为一个观察值,而江苏—日喀则—2010年则是另外一个观察值。为了更好地匹配处理组,选取所有未建立援受结对关系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作为控制组。最终本文得到了17个省份×133个城市×24年,共54264个样本数据<sup>③</sup>。

## (二)识别策略

本文主要以对口支援政策的地区间援受结对关系建立作为准实验考察对口支援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样本包括所有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为验证本文研究假说,参考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3)的研究,建立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进行检验,计量模型为:

$$num_{i,j,t} = \alpha aid_{i,j,t} + \beta X_{i,j,t} + \lambda_{ij} + \lambda_{it} + \lambda_{jt} + u_{ijt} \quad (1)$$

其中,下标*i*为企业总部所在地(省份层面),*j*为异地分公司所在地(城市层面),*t*为年份。 $num_{i,j,t}$ 为*i*省所有注册企业在*j*城市第*t*年新增分公司的数量(加1取对数处理),本文以此衡量企业的跨地区经营行为; $X_{i,j,t}$ 表示支援省份—受援城

① 港澳台不在本文考虑的样本之内。

② 由于数据受限,无法精确知道支援的城市,只能将范围扩大到省份。此外,中央指定的是具体哪个省份支援西部城市,而对应省份再根据本省城市经济发展等因素,将对口支援任务分配到相应城市。相对于中央指定的援受结对关系,省份根据自身情况指定本省具体城市支援受援地区具有较大的内生性。

③ 具体支援省份和受援城市样本见附录部分(二)。

市对层面的控制变量,和交通基础设施有关的变量有高速铁路、长江航运,和地区间历史文化相关的变量有地区间方言差异、清代和民国时期大规模移民,和资源互补性相关的变量有劳动力成本差异、地区间二三产业占比差异和产业相似程度变量,此外还控制了地区间的贸易联系和经济差异变量<sup>①</sup>;  $\lambda_{ij}$  表示支援省份—受援城市配对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支援省份—受援城市配对之间随时间不变的特征;  $\lambda_{it}$ 、 $\lambda_{jt}$  分别表示支援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受援城市—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支援省份和受援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例如支援省份的经济发展以及受援城市招商引资政策等因素;  $aid_{i,j,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是否结对,如果省份  $i$  在  $t$  年已对口支援地区  $j$ , 则取 1, 否则取 0;  $u_{ij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使用以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附表 2 是本文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三) 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为基准回归模型(1)的回归结果。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多维度的固定效应,从而尽可能减少扰动因素对本文结果的干扰。列(1)至列(4)依次加入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层面的控制变量及其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对口支援变量  $aid_{i,j,t}$  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口支援政策显著促进了支援省份的企业在受援城市开设分公司。其中,表 1 列(4)的系数大小为 0.202,表明在对口支援政策实施后,建立援受结对关系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相对于未建立援受结对关系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支援方企业在受援地开设分公司的总数增加了 20.2%。

表 1 对口支援与企业跨地区经营

变量	(1)	(2)	(3)	(4)
$aid_{i,j,t}$	0.223*** (0.037)	0.209*** (0.036)	0.203*** (0.036)	0.202*** (0.036)
高速铁路	否	是	是	是
长江航运×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方言差异×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历史移民×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GDP 差异×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贸易联系×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① 控制变量的定义方式和选取标准具体见附录部分(三)。

(续)

变量	(1)	(2)	(3)	(4)
工资差异×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产业差异×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产业相似×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支援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受援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sup>2</sup> 值	0.780	0.782	0.783	0.784
样本量	54264	54264	54264	54264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层面的标准误。

#### 四、有效性检验

##### (一)事前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平行趋势假设(Gentzkow, 2006),即如果没有对口支援政策,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新增分公司数目应保持相同的趋势。为了检验这一点,本文将基准回归拓展到如下动态模型,考察对口支援对企业跨地区经营影响在政策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趋势,动态模型如下:

$$num_{i,j,t} = \sum_{k=-12}^{12} \alpha_k aid_{i,j,t_0+k} + \beta X_{i,j,t} + \lambda_{ij} + \lambda_{it} + \lambda_{jt} + u_{ijt} \quad (2)$$

其中,  $t_0$  表示省份  $i$  与城市  $j$  建立对口支援结对关系的年份,  $k$  表示距离对口支援政策实施年份的时间,在政策实施前为负数,实施后为正数。因此,系数  $\alpha_k$  表示政策实施后第  $k$  年对口支援政策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差异相对于政策实施前一年( $k=-1$ )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差异之差。

附图1报告了系数  $\alpha_k$  随时间变化趋势图,在对口支援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是满足平行趋势的。在对口支援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总的企业跨地区新增分公司数目相对控制组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总的企业跨地区新增分公司数目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对口支援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具有显著正的效用。该图的结果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未拒绝事前趋势平行的假设。

##### (二)安慰剂检验

进一步排除其他不可观测的混杂因素对本文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倘若不

可观测因素对本文估计结果影响不大,那么在支援省份对受援城市进行对口支援之前,相比对照组的支援省份—受援城市对,处理组的企业跨地区经营行为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本文借鉴 Topalova(2010)的做法,进一步进行安慰剂检验,保留对口支援政策实施之前的样本,并分别使用1994年、1995年作为虚假的对口支援结对关系生成时间。由于在该样本区间,并未建立援受结对关系,所以在虚假的结对关系生成时间下(1994年、1995年),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企业跨地区经营数目不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任何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显著差异,则表明除对口支援政策这一事件外,可能还存在其他不可观测的混杂因素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结果变量产生影响,从而对本文因果效应的识别策略产生干扰。

但正如附表3所示的回归结果,所有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其他不可观测的混杂因素对两组个体结果差异产生的影响。由此说明本文基准回归识别出的政策效果确实为对口支援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净效应,进一步印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可信性<sup>①</sup>。

### (三)控制其他对口支援政策的影响

本文评估了主要对口支援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可能忽略了少数其他类型的对口支援对本文结果的干扰。为此,本文将进一步排除其他类型对口支援的影响。在本文样本期间主要有其他两种类型的对口支援:一种是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对口支援,该对口支援由于范围较小,并且无法准确确定对口援助双方,故在基准回归中没有考虑;另一种是甲型H1N1流感救治对口支援,该对口支援主要是以医疗支援为主,并且是短期应急性的支援,理论上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较小,本文也未考虑。尽管如此,为了使本文结果更加准确,排除这两种对口支援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可能影响。在排除了上述两种对口支援的影响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

### (四)处理效应异质性检验

本文的识别策略是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尽管本文进行了很多有效性检验,该方法的估计结果仍然可能存在偏误。为了修正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研究设计中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的潜在偏误,大量理论计量工作不断涌现,并提出了多种“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 1.处理效应异质性检验:Goodman-Bacon分解法

在使用“异质性—稳健”估计方法进行估计之前,首先使用Goodman-Bacon(2021)提出的分解法检验处理效应异质性对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否产生严重的偏误

<sup>①</sup> 本文还做了其他稳健性检验,包括被解释变量重新度量,不同聚类稳健标准误,考察特定事件冲击,变换样本范围和控制其他对口支援政策,具体做法见附录部分(四)。

问题。根据附表10所示,使用“从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的比重较大,且对应的平均处理效应符号与使用“接受过处理组”为控制组的符号相同。此外,根据附图2所示,权重为负的观察值很少,说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本文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问题不大。尽管如此,为了使本文结果更加稳健,还计算了其他的“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 2. 异质性—稳健估计方法

为了本文结果更加稳健,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缓解处理效应异质性导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量产生偏误的问题。

第一,插补估计量。本文借鉴Borusyak等(2024)、Liu等(2022)的做法,使用插补估计量(Imputation Estimator)构造反事实结果进行估计。并借鉴刘冲等(2022)的做法,本文使用插补估计方法得到的系数动态趋势图如附图3a所示,回归系数在事前都是平行的,在事后系数显著大于0,进一步说明对口支援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

第二,堆叠回归估计量。本文参考Cengiz等(2019)的做法,采用堆叠回归估计量(Stacked Regression Estimator)进行稳健性检验。堆叠回归估计方法的回归系数动态趋势图如附图3b所示,事前的系数都在0附近,事后的系数显著大于0。进一步说明对口支援政策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

## 五、机制分析

### (一)政府搭台

#### 1. 信息桥梁效应

“政府搭台”体现在政府作为东西部发展的桥梁,通过提供组织服务帮助企业更加了解受援地区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这种异地信息和资源获取优势能够帮助企业在受援地区进行跨地区经营。例如,支援省份会派干部、企业家等人员去受援地区进行调研访问,帮助了解西部受援地区资源禀赋等信息。比如,2003~2015年,支援地区到受援地区挂职干部平均每年有159人次,到2018年达到12412人次;2003~2015年,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挂职干部平均每年有341人次,到2018年达到15462人次<sup>①</sup>。本文接着对该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第一,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根据人口抽样调查中关于受教育程度的微观统计数据,参照张可云等(2023)的做法,将在支援省份和受援城市间流动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包括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加1取对数处理),基于式(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1列(1)、列(2)所示,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sup>①</sup> 数据来源:根据原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数据统计。

对口支援政策通过促进地区间的人员交流,降低跨地区经营面临的信息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在受援地区进行跨地区经营,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政府搭台”的机制。

第二,本文采用调节效应对信息桥梁效应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即比较对口支援对高信息成本地区对和低信息成本地区对的企业跨地区经营影响的差异。具体地,本文根据2000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现住地和五年前常住地”识别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情形,并使用地区间流动人口总量度量地区间人口流动活跃程度,当*i*省向*j*城市的人口流动活跃程度大于中位数时定义为地区间信息不对称低组(此时 $com$ 取值为0),小于中位数为地区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组(此时 $com$ 取值为1)。接着将该变量与对口支援变量交乘,代入式(1)中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1列(3)、列(4)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第三,本文借鉴陈勇兵和程垦(2024)的做法,通过考察对口支援对不同类型跨地区经营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检验信息桥梁效应。理论上,倘若该机制成立,将看到对口支援会对信息成本更加敏感的跨地区经营类型促进作用更大(Lin等,2022)。本文使用技能劳动力行业异质性和企业绩效异质性程度作为信息成本敏感度的度量指标<sup>①</sup>,并据此分别检验对口支援对企业不同类型跨地区经营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如附表12所示,对口支援主要促进企业向高技能劳动力密集行业开设异地分公司,而对企业在低技能劳动力密集行业开设异地分公司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也显著促进了企业向高技能劳动力密集行业跨地区经营数目占总数目比值的增加;对口支援主要促进企业向高绩效异质性的行业开设异地分公司,而对企业在低绩效异质性的行业开设异地分公司没有显著影响,同时也显著促进了企业向高绩效异质程度的行业跨地区经营数目占总数目比值的增加。上述结果说明对口支援的确通过降低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信息成本促进了企业跨地区经营。

## 2. 示范引领效应

在考察国有企业“率先投资”的示范引领效应之前,本文首先验证对口支援政策对国有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促进作用。具体地,本文计算支援省份—受援城市一年份层面的国有企业开设分公司的总数,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基于式(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3列(1)所示,对口支援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口支援政策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跨地区经营。本文接着考察国有企业“率先投资”对后续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引领带动作用,具体地,本文将国有企业滞后一期变量 $SOE$ 与对口支援变量 $aid_{i,j,t}$ 进行交乘加入式(1)中,并计算省份—城市一年份层

<sup>①</sup> 选择这两个指标作为信息成本敏感度度量指标的原因以及具体指标构建方式见附录部分(五)。

面的非国有企业开设分公司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3列(2)所示,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 3. 政策协同效应

金融优惠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国家或区域重大战略的常见举措。在对口支援政策中,各级政府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对口支援,纷纷出台了形式多样、具有较高覆盖率的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本文接下来分别考察对口支援是否通过财税支持和金融支持政策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

第一,本文实证检验是否存在金融优惠这一渠道。具体地,本文根据企业名称筛选出包含“银行”“信用社”“金融”字眼的企业,计算其新建的分公司数目,并加总到支援省份—受援城市一年份层面,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对口支援政策是否促进了金融机构前往受援地开设分公司,以帮助支援企业更好地获得信贷资金等资源。本文基于式(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系数如附表14列(1)所示,对口支援政策显著促进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前往受援地区开设异地分公司。本文接着将样本分为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4列(2)、列(3)所示。回归系数表明,对口支援均显著促进了这两类金融机构前往受援地区开设异地分公司,一定程度上说明对口支援同时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降低了支援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了企业跨地区经营。

第二,本文接下来实证检验是否存在税收优惠这一渠道。具体地,倘若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的重要因素,那么可以预期相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对口支援政策对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的跨地区经营促进作用更大。为了验证该推论,本文利用Rajan和Zingales(1998)所提出的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后文简称“RZ指数”),根据企业所属行业RZ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融资依赖度与低融资依赖度两类进行比较。附表14列(4)、列(5)分别汇报了两种划分方式的估计结果,对口支援政策显著促进高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跨地区经营行为,而对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跨地区经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 (二)企业唱戏

### 1. 非国有企业参与

“企业唱戏”体现在作为市场主体力量的非国有企业参与对口支援。非国有企业参与对口支援更注重回报,即对口支援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无偿援助,企业在支援的同时也寻求自身发展。倘若对口支援更多地通过“企业唱戏”的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非国有企业作为市场力量的重要部分,对口支援应当促进其跨地区经营行为。

为此,本文根据全国工商注册数据库的企业类型变量,计算非国有企业新建异地分公司数目,并加总到支援省份—受援城市一年份层面,基于式(1)重新进

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5列(1)所示,对口支援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跨地区经营。在列(2)中,本文进一步将样本缩小至外资企业,接着考察对口支援对外资企业跨地区经营的影响,可以发现系数显著为正。在列(3)中,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变换为非国有企业跨地区经营分公司占比,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对口支援更加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跨地区经营。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非国有企业是积极参与对口支援的重要主体之一。理想情况下,在对口支援的经济活动中政府应更多地起到服务的作用,如加强企业与欠发达地区的对接、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王小林和谢妮芸,2022)。而实际的支援活动应当交给企业,也就是“企业唱戏”的模式。本文的实证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模式的作用。

## 2. 比较优势匹配

“企业唱戏”还表现为对口支援在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的过程中,相较于其他企业,与受援地区比较优势相契合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参与对口支援,也就是说参与跨地区经营的企业通常会投资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最大化发挥受援地的资源禀赋优势。为此,根据对口支援前城市 $j$ 二位数行业 $k$ 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来探究对口支援政策是否主要促进与受援地区比较优势相契合企业的跨地区经营。本文分别使用区位商指数和DBI指数来测算比较优势行业(Balassa, 1965; 赵婷和陈钊, 2019; Guo等, 2020; Guo等, 2023)<sup>①</sup>。分别基于上述两个指数,本文将样本分为比较优势行业和不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跨地区经营,并基于式(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6列(1)、列(2)、列(4)、列(5)所示。此外,本文在列(3)、列(6)中将被解释变量变换为比较优势产业新建跨地区分公司占比。从结果可以看出,对口支援更加促进受援城市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吸引支援企业进行跨地区经营。

进一步地,本文考察对口支援对企业跨地区经营的行业异质性影响。通常来说,东部发达地区大多面临着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的问题,作为支援方的地区可以把受援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利用双方发展水平的“落差”,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受援地区。而参与对口支援的企业大都来自东部地区,它们向受援地投资的目的之一就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受援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企业将自身的优势与受援地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优惠政策等优势结合起来,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例如浙江娃哈哈集团以对口支援为契机,通过兼并当地企业入驻涪陵,并从中摸索出在外地投资办厂的经验,之后又在四川绵阳、宜宾等西部地区设立10多个分厂,扩大了西部市场的占有率;水星家纺在贵州凤冈建设桑蚕基地,联合利华在贵州遵义建设可持续茶园等。因

<sup>①</sup> 这两个指数的具体构建方式见附录部分(六)。

此,理论上,对口支援政策会使得支援省份的企业更倾向于开设农业或制造业分公司。

具体地,本文将新建跨地区分公司按照分公司所属行业分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子样本,分别考察对口支援对企业在这三类行业设立分公司的异质性影响,并基于式(1)分别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7所示,对口支援主要促进了企业在受援地区开设农业和制造业分公司,而对服务业的跨地区经营影响不显著,符合预期。

### 3. 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是影响企业进行跨地区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Alcácer和Chung,2014)。企业在进入受援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时,会产生一些经济机会,引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和聚集(Kline和Moretti,2014)。第一,本文考察企业进入受援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进行跨地区经营的同时,是否会促进当地原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具体地,本文根据DBI指数将受援地区新建企业分为比较优势行业的新建企业和不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新建企业,分别计算这种类型新建企业数目,考察对口支援分别对受援地区这两类产业的发展。回归模型如下:

$$num_{j,t} = \alpha aid_{j,t} + \beta X_{j,t} + \lambda_j + \gamma_t + u_{jt} \quad (3)$$

其中, $aid_{j,t}$ 表示受援城市 $j$ 是否在 $t$ 年接受对口支援,是为1,否则取0; $num_{j,t}$ 表示新建企业数目,并取对数; $X_{j,t}$ 表示城市层面的时变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收入与公共财政支出的比值、地区货运总量、地区人口密度、外商投资规模; $\lambda_j$ 为城市固定效应, $\gamma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u_{jt}$ 为扰动项。聚类标准误聚类到受援城市层面。回归结果如附表18列(1)、列(2)所示,对口支援显著促进比较优势行业的发展,对不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第二,集聚效应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是否形成产业集群。本文利用DBI指数计算受援地区是否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Cluster_{jt}$ ,是为1,否为0,并基于式(3),将被解释变量改为 $Cluster_{jt}$ ,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8列(3)所示,对口支援政策显著促进了受援地区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第三,参考徐明(2023)的做法,本文分别使用受援地区企业总数(取对数)、受援地区独立建立的企业总数(企业总数减去异地分公司数目)作为集聚效应的代理变量,并基于式(3),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附表18列(4)、列(5)所示,对口支援变量 $aid_{j,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说明,对口支援政策会产生集聚效应,进一步促进东部支援企业进行跨地区经营。

## 六、结论与启示

为促进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对口支援政策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欠发达地区发展政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虽然中国实施对口支援政策已较长时间,但系统评估其对微观企业的经济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等方面的探讨仍然非常匮乏。本文试图从微观企业跨地区经营的角度,全面考察对口支援政策的经济后果。本文利用1994年以来逐步推行的东西部对口支援结对政策这一准实验,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探讨支援省份与受援城市建立援受结对关系能否促进企业前往受援地区进行跨地区经营。结果发现,当支援省份和受援城市形成援受结对关系之后,支援省份的企业会增加在与其省结对城市的跨地区经营行为,具体表现为开设分公司的数量会增加20.2%,这一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对口支援主要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政府搭台”体现在:第一,政府会提供组织服务以降低企业跨地区经营面临的信息成本。例如,支援地区会派干部以及企业家等人员去受援地区进行调研访问,帮助企业了解西部受援地区资源禀赋等信息。本文实证发现对口支援会促进高学历人才支援受援地区,也会对信息成本更加敏感的跨地区经营类型促进作用更大。第二,在政府引导下的国有企业“率先投资”行为也会对后续非国有企业的跨地区经营起到引领带动作用。第三,政府会给支援企业提供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以降低企业跨地区经营的融资和生产成本等,从而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企业唱戏”体现在:第一,在市场机制下,非国有企业等市场主体力量会参与企业跨地区经营。第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会出现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匹配,与受援地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企业会更倾向于进行跨地区经营参与对口支援,同时会进一步形成地区间的产业分工。第三,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参与对口支援的过程中也会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促进企业跨地区经营和当地优势产业的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前提是要素能够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本文揭示了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阻碍企业跨地区经营重要因素的情况下,破除信息壁垒是对口支援制度发挥影响的关键机制。因此,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间应着力推动建立跨区域企业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数字技术等整合各地产业政策、市场供需、资源禀赋等关键信息,构建统一规范的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同时建议支援省份定期组织对口调研团(包括干部、企业家、专家学者等),通过现场走访、专题研讨、项目洽谈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当地发展需求与投资环境。在政务数据共享方面,建议推动建立跨区域政务数据交换机制,编制发布企业跨地区经营政策清单与服务指南,系统梳理各地招商引资、土地使用、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政策措施,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参与对口支

援的积极性。

第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依赖于计划和行政手段,排斥市场的参与。特别是在传统对口支援政策单向经济利益转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激励明显不足,往往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本文的结论显示,中央统一指定、地方互利互惠的对口支援机制,通过地方政府对企业提供的支持引导与市场化环境,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因此,建议受援地政府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组合,如设立对口支援企业发展引导基金,对符合地方产业导向的支援企业,特别是与受援地产业高度匹配的非国有企业,在贷款贴息、所得税减免、用地保障等方面予以差异化扶持,从而降低企业跨地区经营面临的成本与风险。同时,建议明确国有企业在对口支援中的引导任务清单,推动“先行先试”,发挥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示范引领效应,吸引更多民营企业跟进投资,逐步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互动格局。

第三,要有效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地区所具备的独特资源和比较优势。本文结论显示,对口支援政策对与受援地区比较优势相契合的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同时这种促进作用也会带动受援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因此,建议对口支援双方政府出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指引”,明确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目录和扶持政策清单,为企业跨地区经营提供清晰导向。同时,推动建立跨区域共建产业园区,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引导企业围绕资源禀赋、上下游协同和市场需求,选择性地开设异地分公司。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鼓励大型骨干企业在受援地设立区域性总部、研发中心或运营节点,通过“产业链延伸—企业集聚—集群培育”的路径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此外,应注重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对形成较强产业带动效应的项目予以持续支持,从而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注入稳定的外部动能,助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 参考文献

- [1]曹春方,贾凡胜.异地商会与企业跨地区发展[J].经济研究,2020,(4):150~166.
- [2]曹春方,刘秀梅,贾凡胜.向家乡投资:信息、熟悉还是代理问题?[J].管理世界,2018,(5):107~119+180.
- [3]曹春方,夏常源,钱先航.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9,(1):179~191.
- [4]陈勇兵,程昱.方言差异与企业地理边界扩张[J].世界经济,2024,(9):208~232.
- [5]董珍,白仲林.对口支援、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对口援藏为例[J].西南

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3):130~138.

[6]方军雄.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J].管理世界,2008,(9):118~123+148+188.

[7]贺灿飞,肖晓俊,邹沛思.中国城市正在向功能专业化转型吗?——基于跨国公司区位战略的透视[J].城市发展研究,2012,(3):20~29.

[8]洪银兴.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M],格致出版社,2020.

[9]侯景新,于子冉.对口合作的形成机制与实践启示[J].区域经济评论,2021,(2):56~62+2.

[10]李磊,刘博聪,王天宇.授人以鱼,授之以渔——对口支援与共同富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2):25~46.

[11]李曦辉,王贵铎,段朋飞,黄基鑫.对口支援的政策逻辑与经济效果评估——以对口援疆为例[J].管理世界,2023,(9):89~107.

[12]刘冲,沙学康,张妍.交错双重差分:处理效应异质性与估计方法选择[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9):177~204.

[13]马光荣,程小萌,杨恩艳.交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资本流动——基于高铁开通和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6):5~23.

[14]潘红波,余明桂.支持之手、掠夺之手与异地并购[J].经济研究,2011,(9):108~120.

[15]潘越,梁伟娟,宁博,叶君妍.跨越山海关:对口合作、资本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5):5~25.

[16]宋渊洋,黄礼伟.为什么中国企业难以国内跨地区经营?[J].管理世界,2014,(12):115~133.

[17]汤玉刚,张鹤鹤.中国特色对口帮扶及其效应研究:来自珠三角“飞地经济”的证据[J].财贸经济,2024,(4):20~35.

[18]王玮.中国能引入横向财政平衡机制吗?——兼论“对口支援”的改革[J].财贸研究,2010,(2):63~69.

[19]王小林,谢妮芸.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J].探索与争鸣,2022,(3):148~159+180.

[20]吴意云,朱希伟.中国为何过早进入再分散:产业政策与经济地理[J].世界经济,2015,(2):140~166.

[21]吴育辉,刘晓玲,吴世农.“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跨区域并购[J].管理科学学报,2023,(1):55~82.

[22]徐明.中国省际合作帮扶政策的经济效应——对21世纪“19省市对口援疆大型区域扶贫项目”的评估[J].经济学(季刊),2023,(3):1202~1225.

[23]许宪春,雷泽坤,窦园园,柳士昌.中国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21,(2):5~22.

[24]杨继彬,李善民,杨国超,吴文锋.省际双边信任与资本跨区域流动——基于企业异地并购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1,(4):41~59.

- [25]张可云,冯晟,席强敏.东西部协作政策效应评估——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3,(12):61~79.
- [26]张莉,朱光顺,李夏洋,王贤彬.重点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J].中国工业经济,2017,(8):63~80.
- [27]赵明刚.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模式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1,(2):56~61.
- [28]赵婷,陈钊.比较优势与中央、地方的产业政策[J].世界经济,2019,(10):98~119.
- [29]祝丽敏,于文蕾.新时代对口支援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微观证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4):61~75.
- [30]Acosta C., Lyngemark, D. H., 2021, *The Inter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Firms: Evidence from Denmark*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24, 103366.
- [31]Alcácer J., Chung W., 2014, *Location Strategies for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12), 1749~1761.
- [32]Balassa B., 1965,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33(2), 99~123.
- [33]Bernile G., Delikouras S., Korniotis G. M., Kumar A., 2023, *Geography of Firms and Propagation of Local Economic Conditions*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1(4), 437~464.
- [34]Bertrand M., Mullainathan S., 2003, *Enjoying the Quiet Lif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Preferenc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 1043~1075.
- [35]Borusyak K., Jaravel X., Spiess J., 2024, *Revisiting Event Study Designs: Robust and Efficient Estima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6), 3253~3285.
- [36]Cengiz D., Dube A., Lindner A., Zipperer B., 2019,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3), 1405~1454.
- [37]Collier P., Hoeffler A., 2004, *Aid, Policy and Growth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8(5), 1125~1145.
- [38]Dalgaard C. J., Hansen H., Tarp F., 2004, *On The Empirics of Foreign Aid and Growth*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14(496), 191~216.
- [39]Fan J., Zou B., 2021,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ird Fro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Hinterland*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2, 102698.
- [40]Galliano D., Soulié N., 2012, *Organizational and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the Multi-unit Firm: Evidence from French Industry* [J], *Regional Studies*, 46(7), 907~926.
- [41]Gao W., Ng L., Wang Q., 2008, *Does Geographic Dispersion Affect Firm Valuation?*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4(5), 674~687.
- [42]Gentzkow M., 2006, *Television and Voter Turnou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3), 931~972.
- [43]Giroud X., Mueller H. M., 2019, *Firms’ Internal Networks and Local Economic Shock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10), 3617~3649.

[44] Giroud X., Rauh J., 2018, *State taxation and the realloc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y: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level data*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3), 1262~1316.

[45] Goodman-Bacon A., 2021,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25(2), 254~277.

[46] Gordon R. H., Bovenberg A. L., 1996, *Why is Capital So Immobile Internationally? Possible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 Income Tax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5), 1057~1075.

[47] Guillaumont P., Chauvet, L., 2001, *Aid and Performance: A Reassessment*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7(6), 66~92.

[48] Gumpert A., Steimer H., Antoni M., 2022, *Firm Organization with Multiple Establishment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7(2), 1091~1138.

[49] Guo D., Jiang K., Xu C., Yang X., 2020, *Clustering,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5), 1207~1239.

[50] Guo D., Jiang K., Xu C., Yang X., 2023, *Geographic clusters, regional productivity and resource reallocation across firms: Evidence from China* [J], Research Policy, 52(2), 104691.

[51] Kline P., Moretti E., 2014,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Big Push: 100 Years of Evidence from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1), 275~331.

[52] Liao W. C., 2012, *Inshoring: The Geographic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and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72(1), 1~16.

[53] Lin Y., Qin Y., Sulaeman J., Yan J., Zhang J., 2022, *Expanding Footprints: The Impact of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on Corporate Locations* [J], Review of Finance, 27(3), 1119~1154.

[54] Liu L., Wang Y., Xu Y., 2022, *A Practical Guide to Counterfactual Estimators for Causal Inference with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Data*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8(1), 160~176.

[55] Rajan R.G., Zingales L., 1998,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3), 559~586.

[56] Siegel J. I., Licht A. N., Schwartz S. H., 2011, *Egali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2(3), 621~642.

[57] Topalova P., 2010, *Factor Immobility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on Poverty from India*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4), 1~41.

## Mining Town: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artnership and Firm's Cross-regional Operation

CHENG Ken<sup>1</sup> CHEN Yongbing<sup>2,3</sup>

(1.School of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Center for Macroeconomics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3.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Summary:** The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artnership (RPAP) is an essential strategy for reducing regional inequalities. This study utilizes firm registration data obtained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employs th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examine how the RPAP, which pairs supporting provinces with recipient cities and has been progressively implemented since 1994, affects enterprises' cross-regional operation. We find that the partnership promotes firms' cross-regional operation, and the results are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government setting up the stage and enterprises putting on the show are the main mechanisms. "Government setting up the stage" plays a guiding role where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addresses market failures and is reflected in three ways—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rough official and entrepreneurial exchanges,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ioneering investments," and offering financial and tax incentives that lower operational costs. "Enterprises putting on the show" embodies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s evidenced by the policy's significant promotion of cross-regional expansion among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irms in industries aligned with the recipient region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is further generates agglomeration effects that sustain cross-regional business growth. The Partnership also induces industrial division between supporting provinces and recipient cities; for example, the effects are pronounced for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this study scientifically evaluates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hina's RPAP—a mega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 cross-regional operations, thereby expanding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PAP.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on RPAP qualitatively discusses its development from a poverty reduction perspective, and the limited quantitative studies primarily explore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cipient regions, failing to deeply reveal how firms adjust their cross-regional operations under policy impetus. However, the internal information flows, service flows, capital flows, as well as personnel mobility resulting from firms' cross-regional operational behaviors, are of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chieving r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collaboration, helping realize the objectives of the paired assistance policy arrangement,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tructs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of a firm's cross-regional operation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RPAP, providing policy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its economic impacts and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paths.

Second, RPAP i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for coordinat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nd reshaping inter-government interactions.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influencing firm cross-regional operations from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 coordin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 transitioning developing country.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the causes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domestic market fragmentation, research specifically discussing how to break domestic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promote firm cross-regional operations is quite limited. As an embedd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RPAP follow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government setting up the stage, enterprises putting on the show." Here, "government setting up the stage" involves strategic interven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by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to address market failures, thereby significantly reducing information barriers, institutional costs, and policy uncertainties faced by firms in cross-regional operations. "Enterprises putting on the show" ensures the effective exertion of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ultimately helping firms achieve geographical expansion.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how inter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influences firm behavior but also provides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institutional synergy can activate market forces"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artnership; Firm's Cross-regional Operation; Government Setting up the Stage; Enterprise Putting in the Show;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D21; L22

(责任编辑:张容嘉;数据编辑:无 名)